

黑 雀 群

陆天明◎著

作家出版社



黑雀群

陆天明◎著

在写完《泥日》《桑那高地的太阳》《木凸》那样一些自我寻思的作品，又经历了像《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那样一种极贴近现实的大众化宏大叙事写作实验，陆天明严重地感到自己再一次面临文学上的精神上的“生死煎熬”。他无意去复制和克隆从前的那个自己。他必须在有限的挣扎中找到他一生为之俯仰蹉跎的那条“真文学”的路。他非常清楚，如果没有新突破，他仍然有可能完不成自己从少年时代就开始的这种追求。近三年来，他一直沉浮在这种外界的喧嚣和内心的逼迫焦虑之中，发誓要做出一部既为中国当代的民众接受，又非常文学，且真有益于历史前行的小说。他重新回到那个始终让他魂牵梦绕的荒原上，在狼的嗥叫和人的奋挣中，在现实和历史的交替中，在大起大落的人物命运铺展和深峻辛酸的人性变异的剖析中，如火如荼地，如泣如诉地，以他独有的那种澎湃的激情和自省心态，用粗犷精到的语言，细腻悲壮的笔触，勾勒出一幅当代人的心灵史诗……

他说，这部作品在他自己的创作生涯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他做到了吗？

让我们翻开第一页，读下去……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雀群/陆天明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4. 1

ISBN 7-5063-2847-X

I. 黑… II. 陆…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5870 号

黑 雀 群

作者: 陆天明

责任编辑: 黎云秀

装帧设计: 姜 寻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330 千

印张: 13.5

插页: 3

印数: 001-80000

版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847-X

定价: 2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责任编辑：黎云秀

封面绘图：张守义

封面设计：姜寻工作室

先随便扯上几句

一百年前，吱吱扭扭地赶一辆俄式的“六根棍”马车，带几个羊皮水囊，两条黑白花毡子，一小袋奶疙瘩，一大摞硬硬的发面饼，再带上几捆干苜蓿草，一麻包苞米豆子，二三十个洋葱，从哈拉努里镇出发，走白杨河，野骆驼泉，过红山口，马屎把子，横趟李将军戈壁，直插那个口宽一百六十六公里的麻西坝苇湖，又称唐乌梁海子的——你竖直了耳朵根儿，给我听清楚了，这会儿工夫不管自己有多困多累，都别给我在苇子深处那些窝棚里打盹歇脚。我不是说，每一个在那达打盹歇脚的人都会遭劫杀，但你必须给我赶紧走，裹紧了裸露出你那棕黑色肩膀头的老山羊皮大衣，给我赶紧走，扎扎地一脚穿过帕拉贡嘎拉戈壁，顶着在第二十天头上依然焦黄、灼热、耀眼的日头，再抬起你那早已起皱打蔫的眼皮子，这时你就能看到我跟你说起过的那个冈古拉荒原了。你就狠狠地冲它啐上一口唾沫星子吧，冈古拉，这个到老也不死心的寡妇，坍塌了多一

半却还耸立在风雪转场道上的破羊圈，长途班车站里那个永远开不大的售票窗口，被杂草和累积起来的喜鹊粪卡住了轴轳因而再也无法转动却总也想转动的旧水轮……哦，冈古拉，它又像一个残存的古堡，永远在辉煌的灰黄中，似隐似现……每年四月，它都会从那条巍然凝固了三百五十亿年的地平线上慢慢隆起。啊，那是条什么样的地平线啊，破损、坚硬，而又顽固。而就在这条地平线上，一百年前分明还耸立着一大片茂密的黑杨林，盘旋着一大片黑雀群。至今没人说得清这片黑杨林到底有多大，到底是从哪一朝哪一代的哪一年开始挣扎出地面的。也没人说得清这个黑雀群里到底有多少只翻飞的黑雀，更没人说得清这些黑雀从哪里来，又要往哪里去。说不清。没人说得清。但只要你站在高地底下，眺望那片高高的黑杨林，并追寻那在四月的天空下翻飞窜掠的黑雀群，你一准儿能发现，顶着成团状翻滚的云阵，冈古拉它晴天一个样儿，阴天一个样儿，刮风下雨、电闪雷鸣又一个样儿。母狼拼命吼叫时，它一个样儿，母狼们不吼时，它，又一个样儿……是的，它总是那么的变化无常，变幻莫测，让人捉摸不定，却又让人割舍不下……

冈古拉啊冈古拉，每一回瞧见你，我都想哭。每一回瞧见你，我都浑身发紧，心头打颤，嘴角生烟，舌尖僵硬——韩起科不止一次地这么跟我念叨过。每一回都说得斩钉截铁，掷地有声，暴了皮的厚嘴唇上，同时挣开一道道焦裂的血口子，颤抖着的眼眶里满盈一汪咸咸的泪水。

二

接下来再跟你说说我和韩起科这狗屁孩子的那点狗屁关系……那年，我也就二十三四岁吧

那年，我也就二十三四岁吧，还在哈拉努里镇政府机关当一名普通办事员。那天，从贝加尔湖方向平推过来的第一场寒流，裹挟起鹅毛般大的雪片，把满世界搅得浑浑噩噩，沟平渠满。下午，果然通知下来，分烤火煤。镇政府机关里的绝大多数人赶紧抄起箩筐、麻袋、扁担、抬把子和破铁桶，紧着往小食堂后院跑。那一阵不分男女老少、级别高低、职务大小的谑笑和打闹，把一大群正蹲在院墙外大杨树上观雪景的黑老鸱惊飞了。机关干部中自有少数几个人不上前去跟着“哄抢”这头一车拉来的烤火煤，其中之一，就是我。我像往常一样，掂着自己那个柳条编的破抬把，默默地在一旁瞅着，安心地等待着，任凭越下越紧的雪帘儿铺白我黑棉大衣的肩膀头和那顶已经很旧了的“三块瓦”狗皮帽。（当地一种尖顶、不带帽檐儿的皮帽。多数用野兔皮缝制。）我不急着上前“哄抢”，并非因为我生性清高谦和。不是。并非因为我屋里已经有烧的了。也

不是。并非因为今后自有人会给我往屋里送。更不是。你想啊，谁会给一个进机关才两三年的普通办事员送烧的？不会。我之所以这么做，完全出于自己多年来的一个人生信条——但凡在人群聚集的地方，只要你愿意，并善于在关键的时刻，在人前低一下你自以为尊贵的头，或后退一步，适当地给别人让出一部分空间，去挣吃挣喝，到最后，你绝对吃不了亏。你也许瞧不起我这种人，更瞧不上我这人生信条。我不跟你争论。有言道：十个手指头伸出来还不一般齐哩。我不强求你跟我一致。我也强求不成。但我要告诉你，这句充满我辈人生辛酸的话，其实千百年来只被国人说出了一半，而它更重要的另一半却往往无数地被忽略了，那就是：十个手指必须不一般齐，这世界方成正局。而我，天生就是一个在后头稍着站的“小拇指”。那又怎么样呢？小拇指再小，也是呆在了手上，总比那捂在黑臭黑臭的鞋窠里的大脚拇趾强啊！您说呢？

……对不起。扯远了。咱们接着往下说。

……十来分钟后，保密员小哈穿着一身紧身的小花棉袄，小心翼翼地冲我走了过来，以她独有的那种矜持和木然，在我面前站定，细声细气地通知我：“领导找。”小哈比我大一岁，或两岁。我一直挺喜欢她。她其实长得并不好看，但我还是喜欢她。我还喜欢她身上那一股气味儿。那是一种由蛤蜊油、百雀灵和廉价香皂无意间调和成的气味儿。这种混合气味儿，在哈拉努里镇那条惟一的街道上（如果它还能被称作是“街道”的话），并不稀罕。但只有闻到她身上的这种气味儿时，我才会隐隐地产生一种晕眩的感觉，一阵隐隐的几乎又是无法抑制的心跳，总会想起她床上铺着的那条深蓝色的塑料床单和深秋时分帕拉贡嘎拉湖面上那冰冷刺骨的波纹。但，无论是这种“晕眩”，还是那种“心跳”，我都没跟她表白过。我不跟她表白，绝对不是因为我在生理上不行，或心理准备还不够。不。我生理上心理上都挺行。之所以不跟她表白，说穿了，很简单：我们

有位年轻的镇长跟她关系不一般。镇长姓宋，名振和。宋镇长虽然早已有妻室家小，但他还是超常规地跟她确立了某种不一般的关系。据说，在他还没当镇长前，他俩就开始了这种“不一般”的艰难历程。而尤其让人感到无奈而又悲壮的是，天性矜持和木然的她，居然会接受这种“不一般”，而且据说，她就是为了这种肯定不会有结果的“不一般”，才执意地坚持不婚不嫁，独身到如今。为此，我不是没苦恼过。但，正如机关主管后勤生活的协理员大叔劝慰我的那样，“这瓜，不是你老弟摘底咧！”我虽然私下曾跟他激烈辩论过，但最后还是平静地无奈地接受了他老人家对事局的这种“冷酷”而又中肯的结论，把所有内心的躁动，都深埋掉了。只当夜深人静，扪心自问，为什么这“瓜”就不该我“摘”？为什么我就不能去“摘”？假如再走到月色撩人的树影底下，张望保密室的窗子——因为工作需要，那窗子上加装了很粗的铁栅栏，左一道右一道，竖一道横一道，把天空分隔成许多块较小的长方形——再看到她站在窗子后头用一种淡漠空洞但又固执矜持的眼神，呆望窗外白杨树上一个个干黑干黑的大鸟窝，我心里依然会有点难过，有点怅惘，也有点无奈，胸臆间还会有点隐隐作疼……

那天派小哈来找我的领导，就是那位年轻的宋镇长。领导传唤，我自不能怠慢，赶紧扔了抬把子，弯腰去抓一大把雪，使劲搓净手上的煤屑，慌慌地上那土楼里去了。

我们这幢土木结构的办公楼，说是“楼”，其实一共只有两层。但当年那也是哈拉努里镇上惟一的“楼”了。镇长办公室在二楼尽东头。我敲开门时，屋里还有别人，好像是从口里来推销什么种子化肥办公用具，或拖拉机零配件的。见进门的是我，宋振和朝门旁一个半人高的大木箱指指戳戳了一下，意思是让我在那儿坐着等一会儿。

这小子只比我大四五岁。所以，只要面对他，或者，每每地坐定下来一想起他，我总免不了会有许多的沮丧或忌恨。而让我感到特别沮丧和忌恨的是，即便我铆足了劲儿，再干个三四年，四五年，也绝对干不到他现在这份儿上——原因，很简单，这小子确实比我能干。有人说，他之所以能干到这份儿上，是因为他有一个当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爹。其实这话说得不够全面，也不够准确。他的确有个老资格的爹，当年随大军打过来，后来留下做地方工作，一直干到县的组织部副部长。有这么点“本钱”的他，跟没这点“本钱”的我们相比，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别说搁在“封建”了几千年的中国，就是搁在“民主”了几百年的欧美各国，我想也会是有所不同的。但，他的这点“本钱”，实际上并没帮上他太大的忙。第一，他的老爸只是个“副”部长。人说“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又说“副官副官，吃饭转圈”。第二，这个“副官”还是“邻县”的。这和在本县当官的效用又差一大截。第三，也是最操蛋的一件事是，当他跟我现在似的，还只是一名普通的乡政府办事员，特别需要他这位老资格的爹提携帮衬的时候，他这位老爹却病倒了，紧接着就病退了。更操蛋的是，他老爹还不是就地病退，而是一脚就退回几千公里以外的老家去了。特别操蛋的是，还把一家老小全办回去了。原先就只不过是邻县的一个副部长，现在又走了，而且全家都走了，跟这儿完全切断了关系。你想啊，他还能留下多少余威、余势、余荫……来提携和帮衬他这个儿子？当时他老爹就顾虑到了这一点（姜还是老的辣），执意地要把他也一起办回去。老爹说，全家都走了，我肯定也没多少日子能活的了，剩你自己一个人呆在这个边远地区求发展，会很难的，还是跟家里人一块儿走吧。他死活不走，说老家的羊肉没法吃，说老家的空气太腻歪人（潮湿），说老家的房子太拥挤街道太弯曲地平线太短小天空太低矮，老家的人瞧外来户都斜着眼等等等等，说了一大堆狗屁

理由，总之，不走。果然就独自留了下来，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一步步走上公社团委书记和镇长的位置、包括跟那位哈采英同志确立非同一般的两性关系等等等等，应该说全靠他自己。正如他老爹临死前给他的评价那样，这小子，能走到这一步，不容易，着实不容易啊。我经常在想，假如，也给我这么一个爹，也让我经历他后来经历的这一切，我敢保证自己能干得像他这样见成效吗？我的答复是：不敢。这正是长久以来，每每面对他，我总多多少少会感到一点沮丧，一点自卑，一点忌恨……但又没法不让自己敬佩他的主要原因。

几分钟后，他匆匆把那俩家伙打发了，又朝其中一位坐过的那把破椅子指指戳戳了一下，意思是让我上那儿坐着去，那儿能离他近些；然后一边把那俩推销员“顺便”捎来的一点“见面礼”悉数收拾进自己身后的铁皮柜，一边开门见山地告诉我，镇临时党委昨晚黑里连夜召开了个“紧急会议”，一致决定要提拔使用我，调我去冈古拉农场高级中学当校长。“该在你小子底肩膀头上压点儿担子啦，不能让你老那么底悠闲舒坦了。啊？咋样咧？”他锁上铁皮柜柜门，然后回转过身子，让自己那刚开始有一点发福的身子重重地落回到座位上——你想啊，他才比我大多点儿？我瘦得跟麻杆儿似的，他却开始发福了——并端起搪瓷茶缸，嘬上一大口浓茶，咕嘟咕嘟地漱了漱口，咽下，再掏出一块还不算太脏的手巾，抹去嘴角上那点茶迹，这才斜起眼，很快地瞟了我一眼，微笑起等待我的反应。机关里的人都把他的这缙微笑称作“火狐子般的亲切微笑”，意思是说他“狡猾”，“聪明”，“机灵”，假如要用东北话来说，那就是“贼聪明”“贼机灵”。用上海话来说就是“兜得转！”但也有人对他的这种机灵精明劲儿，表示过不同看法。比如一位领导过他多年的老同志，就说过这样的话：“这小子咧，但凡能再学得憨厚点儿，肚子里莫长恁些弯弯肠子，那，

这会儿，他最起码底，也得在副县长那把交椅上坐着底咧。”这话，许多人都信。官场上也许就是这样，不聪明不行，太聪明了也不行。最好的选择是让自己聪明得非常“憨厚”。

……对于他突然间向我宣布的这个任命，我的心狂跳不已，一口气顿时也就憋在了胸膛里。让我去冈古拉当“高级中学校长”。“中学校长”，哈哈，真他妈的好听。前边我已经捎带着跟你们把冈古拉描述过一番，是的，冈古拉就是这么一个狗不啃骡不蹶，连公猪都懒得往上爬的糟心地儿，更别再说些什么“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之类的狗屁气话了。整个高地绵延起伏在一片由盐化草甸土、氯化物硫酸盐碱土和青黑色戈壁片石、乳白色细砾石、焦黄色大小沙包、深浅莫测的苇湖沼泽、还有那些苦豆子、骆驼刺、铃铛刺、梭梭、芨芨、琵琶柴和旱獭黄羊野兔……一起构成的荒原之上。只有较少一点让人瞧着比较舒心的灰漠土。这灰漠土上办起了一个农场。整个农场只有两千来人。两千来人只拥有两部外线电话（其余的都属于那种“场内分机”）。也就是说，在那么一个遥远偏僻的角落里，两千来个活人只能靠两部电话机跟外部世界沟通。而这两部电话机还都处在场长同志的直接控制下：一部安装在他办公室，一部安装在他家。也就是说，在冈古拉，不经这位场长同志点头批准，任何人都别想接近这两部电话机，更别说用它跟外界联络了。而惟一的公路交通，是十天一趟的长途班车。惟一的邮路来往，是七天一趟的邮班。要我去执掌的那所所谓的“高级中学”，就隶属这个狗屁不是的农场。整所“高中”只有三十六个学生……这就是对我的“提拔重用”？就是“往我肩膀头上压担子”？真谢谢了！谢了……我竭力镇静下微微颤栗起来的身子，尽量不动声色地去打量镇长同志，希望从他脸上那络正在消失的“火狐子般亲切的微笑”中，能得到证实，这所谓的“提拔重用”只不过是闲来无事跟我开的一个无聊“玩笑”而已。但打量结果却明确地告诉我，这不是玩笑。这是真

事儿。他们是真的在把我往那棵“歪脖子树”上吊啊。

“收拾收拾，明天黑早动身。镇里派车送你。”他说。

“干吗恁急？又不赶着去救火。”我赶紧问。

“告诉司机，车走西坝河子黄沙梁那条路。晚上歇三五零八兵站。已经跟那边打过招呼了。他们负责接待。”他又说。

“干吗非得歇三五零八？”我又问。

“一会儿就去组织组把调动手续办了。”他又说。

“我从来没当过教师。这一下子，急不棱登地就让我当校长……是不是……是不是会给工作带来重大损失……”我试着再问，想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把这任命推托了。

“还有啥问题没有？”说着，他居然站起来要走了。

操！我心里的火一下子就直奔头顶上去了。什么叫“还有啥问题”？我提的所有问题，你一个都还没回答哩。还有啥问题？！我呆站在那儿，直愣愣地看着他。他却已经走到铁皮柜旁边，从楔在土墙上的那根粗大木钉上，去取他那份狐皮领大衣和那顶剪绒皮帽了。“小伙子，咋底啦？走啊走啊，我还有事哩。”他催促着，以为自己在打发另一个土鳖推销员哩！

三

啊，冈古拉……

一出他办公室，我就愣那儿了，琢磨半天，越琢磨，觉得这事儿越蹊跷。蹊跷之一，假如冈古拉真缺一位校长，机关里有的是教师出身的人，干吗非指着我？蹊跷之二，去一个只有三十多个狗屁学生的学校上任，干吗还要限定我出发时间和行走路线？去冈古拉有无数条路线可选择。而西坝河子黄沙梁这条道儿，可以说是所有选择中最糟糕、最没名堂的一种选择。那是一条五十年代中期修建的等外级公路，失修多年，路况极差，布满了大坑小洼不说，有些路段早让洪水冲断，还有些路段则早已消失在铃铛刺、芨芨草和苇子窝之中。特别让我不能理解的是，从那儿走，得多绕出好几十公里去。放着黑油铺就的省道国道近道不走，风雪征程地，偏要我绕那么个大弯，多受那一份大罪，干吗？故意要我咧？当领导的再无聊，再下作，也不应无聊下作到如此地步。不，不会的。别人我们且不去说，最起码，宋振和这家伙不会。他也有许多毛病，但绝对

不是那种无聊下作的领导。从刚才分烤火煤时的表现，你们也可看出，我也不是那种肆意得罪领导，无端惹同事们讨厌的人。起码在公开场合不会。我这人虽然没有特别知心的朋友，但也没有视我为“仇敌”的对手。在一般情况下，我绝对不会伤害别人，当然，也绝对不会允许别人无端地来伤害我。所以，我确信，他们的这种安排不是一种“耍弄”。惟一的解释只能是，发生了什么特别重大的事情，而且，跟“西坝河子黄沙梁”，“三五零八”又有一定的关系。

那……到底是一档什么样的“大事”呢？机关走廊里光线十分暗淡。难道，就像当年摩西必须穿越沙漠，才能拯救犹太人似的，我这回非得要走一走西坝河子黄沙梁，住一住三五零八兵站，才能办得了这档子“大事”？但最近也没听说出了什么特别了不得的事啊。哈拉努里的平静依然像啸叫的雪后狂风，虽然可恨，却永远保持着一副不变的面孔。再说，我是“摩西”吗？不是啊！我这样的狗屁玩意儿，永远也当不了“摩西”啊。至于那个“三五零八兵站”，据我所知，这是军区下了文件要撤消的单位。几个月前，那儿大部分的营房已开始拆迁，大院里断垣残壁，荒草凄凄，一片颓败杂芜景象。非“指定”我上那儿去过夜，难道还想让我在那断垣残壁间，秘演一出新“聊斋”故事？哦哦，这一切，真的让人太匪夷所思了……

但直觉又在告诉我，这件事跟荒唐和无聊绝对无关。宋振和这小子被我们机关里的年轻人一致公认为是那种“干大事”的人。他轻易不胡来。他也有那种气度，不以个人的好恶来取舍人和谋划事。这使许多年轻人特别愿意跟他一起干事，也愿意替他去办事。还有一点，关键时刻，这家伙只用他瞧得上的人；而且，他一旦做了决定，那就绝无更改的可能。他说他这一生，最欣赏的两句话是李大钊说的“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不过得改仨字，把“著文章”改成“治天下”。那就是

“铁肩担道义，辣手治天下”。他常把机关的这帮年轻人找到他屋里去喝酒。三杯下肚，他就会开讲他那“辣手治天下”的宏论。因此，机关里这一帮子年轻干部都特别清楚，对于宋镇长做出的任何决定，你要么低头认命，要么就准备着，跟他对抗到底。您觉得，像我这样的，会有那样一份心气儿跟他对抗到底？所以，即便对这回的新任命琢磨半天我依然云里雾里，不明所以，但最后的决定还是只能有一个：低头吧，去冈古拉。

去冈古拉……走吧。走吧……青山何处不埋人？只待马革裹尸回哦！！

吃罢中午饭，我赶紧抽身回家去打招呼，准备赶第二天黑早起程赴任。虽然心里还是在动荡不安着，但既然已决定受命，晚走就不如早走了。（事后证明，这里的确是隐着个名堂，而且是个“大名堂”。）

我家离哈拉努里镇还有十来公里。老爹是那儿一个畜牧防疫站的兽医助理。老爹正经是个中专毕业生。专业化程度正经比我高。但他一生嗜酒如命，一天两顿酒是天塌地陷也不能少的。他这人就那么怪，好酒，偏偏又沾酒就晕。一天得不着这份晕，他都没法活。晕了，又没法工作——一沾酒，他手就抖，抖得不听使唤，听筒针筒捣药面用的石杵什么的，全都拿捏不住。所以，很多年了，他只能在上午干个三四个小时。中午晚上喝罢酒，就没法再干了。虽说是给牲口看病，好像没人那么要紧，但在咱这地方，牲口往往又是许多老乡的命根子。你要治死了他的坐骑，他的奶牛奶山羊，比治死了他本人还要紧。要那样，真还不如一刀把他自己给劈了呢。就是这传统。我这老爹，不仅医术高明，对牲口、对老乡还都特有感情，绝不允许自己在给牲口瞧病时，干出那类二不跨五的烂糟事儿，把老乡们一生的心血和寄托都晾到了干河滩儿上。所以，只要一喝了酒，总挺自觉地躲到他自个儿那个小屋里去放倒了，绝

不出来应诊。曾经发生过这么一档子事，让我刻骨铭心。那年，他五十大寿，呼朋唤友，必有一通好醉。院子里，临时加砌的三个柴火灶上，咕嘟咕嘟地煮起好几大锅白水羊头。到下午三点来钟，好几大塑料桶的散白酒全喝空了，屋里院内，果然呼呼啦啦躺倒一大片。霎时间，西边云团紧涌，天色骤然昏黑。电闪雷鸣，狂风卷起巴掌大的砾石，直奔帕拉贡嘎拉河对岸的野麻滩而去。紧接着，拳头大的老雨点挟带着浓烈的土腥味儿，砸得人两眼直冒金星。那群或醉或半醉的亲戚朋友，被冰冷的老雨浇醒，强撑着打颤的双腿，纷纷地，或逃进我们家的屋，或逃回他们自己的家。只有我老爹四仰八叉躺在院中间的凉棚底下，怎么搔怎么唤，也不理不睬，只是睡他那自认人生最为享受的酒后觉。不一会儿工夫，只听院门外响起轰轰隆隆一片杂响。家里人都以为这老雨引发山洪，直奔咱家来了。惊瘫了的娘张了张嘴，居然没叫得出声，只是指指依然熟睡的爹，要我们背起他赶紧往后院高处跑。这边我刚抄起爹死沉沉的身子，那边院门却訇地一声被许多人撞开。这时，全家人才闹清，那响声并非源自“山洪”，是野麻滩种马场的人赶着十来辆大车，拉着二三十匹突然中毒的纯种马，找我爹救命来了。据说在种马场另外还倒着四五十匹良种马，而这二三十匹只是中毒最为严重的。听说马中毒了，我爹一下就惊醒了。他努力睁开眼，但还是站不稳身子。他哆嗦，头晕，结结巴巴说不清话。我娘跟着我爹这多半辈子，兽医方面的事也略知了一二，瞧着这些马情况严重，便让这些人别再耽搁了，赶紧把病马往别的兽医站送。但是，最近的兽医站也得有四五十公里。时间已经不允许他们“转院”。再说，这些乡民也不信，除了我爹以外，这世界上还能有谁救得活此刻嘴角鼻孔里已经在流黑血的病马。这时，这些一个个全让大雨浇透了的、并在焦虑中脸色已然变得青白了的乡民，突然齐刷刷地给我爹给我娘跪了下来，一个个都抱住自己的头大声呜咽，抽泣，求我爹不管